

鹿胎消费与宋人的环保意识

王 旭 郭声波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鹿胎”是指尚未出生的幼鹿之皮,用这种鹿皮制成的冠子或饰品具有精巧、外形美观及冬暖夏凉的特点,主要出产于川蜀一带。宋代时消费量巨大,而各阶层的消费动因则有所差别,统治阶层除了自己使用以显示其尊贵身份外,还主要用于祭祀、封禅、赏赐及“乞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普通民众则是为了提高身份地位;文人士子阶层则是因为爱梅。通过对鹿胎消费情况的考察,认为宋人并未形成明确而自觉的环保意识,统治者禁止捕杀生灵的禁令约束力有限。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不合理的消费观念不仅是残杀野生动物的主要动因,还是促使禁令失效的关键。

【关键词】宋代;环保意识;鹿胎;消费;杀生;禁令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1-0113-09

Killing, Demand and Prohibition: a Luxury of Song Dynasty ——the Consumption and Motivation of Deer Fetus

WANG Xu GUO Sheng-bo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Deer fetus is the skin of the unborn fawn, which has mainly produced around the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headgears and the accessories made by deer fetus have such features as delicacy, nice appearance and cool in summer and warm in winter. Although the consumption of deer fetus is great in Song Dynasty, but the motivation of various sections of society is different. The ruling class not only used Deer fetus for Highlighting their distinguished status, but also for Sacrifice, Fengshan, granting a reward and suing for peace with the northern minority regimes. The common people use it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the Intellectuals use it because they love plum. Thu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situation of deer fetus, we can find that th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did not form a clear and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the binding of the prohibition which is made by ruling class has limited effect. The increasing social demand that is not merely the main reason of killing wildlife, but the key to prompt the failure of the ban.

Keywords: Song Dynasty;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er fetus; consumption; killing; prohibition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朝代之一,同时处于生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宋人能否意识到当时的环境问题,并且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缓解尖锐的人地矛盾是学界所关注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宋代是一个能较好地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并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收稿日期】2015-11-03

【作者简介】王旭(1987-),男,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政区地理;
郭声波(1959-),男,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朝代^①。还有一些学者较多关注宋人的环保意识和观念,认为宋人已经有自觉而明确,且又带有朦胧、模糊色彩的生态意识,并将这种生态意识提高到“生态哲学观”、“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高度^②。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宋代存在大量捕杀野生动物的情况,这种捕杀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商业市场的活跃,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③。统治阶级颁布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只是为了加强皇权,而非真正的保护动物^④。可见今人对于宋人的环保意识仍存在争议。本文则首次对作为奢侈品的“鹿胎”消费情况进行考察,进一步对宋人的消费动因、环保法令、环保观念等问题进行再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鹿胎”及其奢侈产品

鹿胎实际上是指一种特殊的鹿皮^⑤,但今人对于这种鹿皮是指怀孕的母鹿之皮还是尚未出生的幼鹿之皮尚存在争议^⑥。笔者认为后一种解释较为正确,如清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卷十一“物产”条谓:“又有鹿胎皮,杀牝鹿而得者。然则成能五、六日将乳者毛片方鲜丽,计得一佳胎皮,杀鹿子母甚多,非先王‘不麝,不卵,不杀胎’之教矣。”又清人郁永河所撰《稗海纪游》曾对这种未出生幼鹿的特征有所描述:“牝鹿以四月乳,未乳极肥。腹中胎鹿,皮毛鲜泽,文彩可爱。”^⑦

宋人杀鹿取胎主要是为了获取幼鹿的皮毛用以制作冠子或饰品,因此史料中常见“以鹿胎为冠”^⑧、“以龟筒、鹿胎、玳瑁为饰”^⑨之类的记载。所谓的冠,是指古代的一种头饰,其功用有别于帽,戴帽主要是用于御寒保暖,而戴冠更大程度上则是为了装饰头面,《麈史》即云:“妇人冠服涂饰……‘始用以黄涂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缀彩罗为攒云五岳之类。’”^⑩这种鹿胎皮又因质量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称呼,质量较好者称为鹿胎,较次者称为透背^⑪。

用鹿胎皮制作的冠子和饰品主要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制作精巧,外形美观。关于制作之精巧,刘克

① 刘华:《宋代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赵杏根:《宋代生态思想述略》,《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1期;等等。

② 张全明:《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的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宋代君臣士民的“环保”言行评价》,《南都学坛》2009年第2期;等等。

③ 魏华仙:《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④ 孙方圆:《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以〈宋大诏令集〉为考察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⑤ 另一说法是指母鹿流产的胎仔或从母鹿腹中取出的成形鹿胎及胎盘。这种鹿胎乃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本草新编》载:“世人有麋、鹿合而成膏,以治阴阳之虚则可耳。然而用麋、鹿为膏,又不若用鹿胎,加之人参、熟地……,为全鹿丸之更妙也。”(陈士铎著,柳璇等校注:《本草新编》卷5《羽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275-276页)也正因为这种鹿胎有药用价值,宋代有食用鹿胎的记载,汪元量《冬至日同舍会拜》载:“葡萄酒熟浇驼髓,萝卜羹甜煮鹿胎。”(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06页)本文所指“鹿胎”是指鹿皮,而非药材。

⑥ 纪昌兰认为是一种由孕鹿肚加工而成的冠子(《宋代女性妆饰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6页),而王雪莉则认为是指尚在妊娠阶段的幼鹿皮(《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⑦ 郁永河:《稗海纪游》,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第100页。

⑧ 脱脱等:《宋史》卷28《高宗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525页。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1,绍兴二十九年二月戊戌,中华书局,2013年,第3003页。

⑩ 王得臣:《麈史》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⑪ 吴自牧:《梦粱录》卷18《物产·丝之品》,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庄有诗云：“羽士过门卖，新翻样愈奇。坚如龟屋制，精似鹿胎为。”^①至于外形美观，前引《稗海纪游》已经说到胎鹿有“皮毛鲜泽，文彩可爱”的特点。又陆佃在《埤雅》中提到布匹花色中有“鹿胎红”、“鹿胎之纹”^②。鹿胎红者，谓鹤顶红子花色红微带黄，上有白点如鹿胎，极化工之妙。欧阳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色，与此颇异。”^③可见时人不仅爱其精巧，还爱其纹路和颜色。其次，鹿胎冠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冬暖”之效自不用多说，从古人以鹿皮为衣可知。至于“夏凉”之功效，宋诗有谓：“觅句静拈鸡距笔，纳凉闲戴鹿胎冠。”^④

宋代鹿胎的产区比较集中，主要出自川蜀一带。成都府路中又尤以西川地区的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和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出产最多。太平兴国二年（977），政府就专门设置受纳匹缎库，接收西川输纳的锦、鹿胎、绫罗、绢织等物^⑤。可能因为这一地区所供锦绮、鹿胎等物重要且数目较大，政府还经常颁发相关的诏令。如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诏应剑南东西、川峡路，从前官市及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欽正、龟壳等，宜令诸州自今只织买绫罗、绉绢、驰布、木绵等，余悉罢去。”^⑥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二月，规定两川所贡锦绮、鹿胎等物下益、梓州两路织买出染^⑦。

二、宋代鹿胎的消费量及各阶层消费的动因

（一）鹿胎的消费量

宋代鹿胎的消费量巨大。据元丰六年（1083）任职蜀地的官员吕陶所述，当时成都府路上供机院织大料、细法锦、透背、鹿胎多达七百三十余匹^⑧。而进入市场交易的鹿胎数则更多。庆历四年（1044），益、梓州两路转运司岁市绫锦、鹿胎一万二千。后因益州路转运使袁抗言“三司每岁于两蜀市绫锦、鹿胎，比岁蜀民困甚，愿少宽其力，以备秦中它日之急。”特与减半^⑨。乾道五年至八年间（1169—1172），各地总共收买了锦绮、鹿胎、透背九千六百一十五匹，其中在京二千七百九十九匹，诸路三千四百八匹：京东东路二百五十四匹，秦凤路一匹，河北西路一千二百四十六匹，两浙路一十四匹，福建路二匹，广南东路一匹，成都府路一千九十四匹段，梓州路八百四匹段^⑩。可见当时地方交易的绫锦和鹿胎多则过千，少则数百。

在民间，因为商品经济繁荣，奢侈之风盛行，采捕、消费鹿胎的情况非常普遍。绍兴二十九年（1159）二月十二日，知枢密院事陈诚之言：“窃见民间轻用物命以供玩好，有甚于翠毛者，如龟筒、玳瑁、鹿胎是也。……至于鹿胎，抑又甚焉。”^⑪可见鹿胎已经成了居民的常用之物，南宋的临安城内还有专门从事“修洗鹿胎冠子”^⑫职业的人。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梭冠》，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725页。

② 陆佃：《埤雅》卷18《释草·芍药》，中华书局，1985年，第479、483页。

③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2《蜀中广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293页。

④ 李至：《仆射相公以鹤算渐高鸿恩未答形于章句冠彼诗流蒙见寄之荣感爱忘之甚诚知寡知岂敢无言亦以鄙怀伸于拙笔庶垂一览聊用发吟》，摘自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555—556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52之23，第5710页。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2，第5449页。

⑦ 《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7，第5565页。

⑧ 吕陶：《净德集》卷4《贴黄》，中华书局，1985年，第44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3，庆历四年十一月，第3721页。《宋史》卷301《袁抗传》载数目为“万三千”。

⑩ 《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5，第6102页。

⑪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61，第6576页。

⑫ 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买》，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二) 统治阶层的“鹿胎”消费动因

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历代封建王朝都对服饰进行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宋代亦是如此。《宋史·舆服志》中就对皇帝、太子、后妃、命妇的服饰以及诸臣的祭服、朝服、公服和时服都有严格而详尽的规定。南宋孝宗朝的梁克家曾说三十年以前,“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①冠帽作为社会人的“身之表”,有标识尊卑的作用。鹿胎冠是珍贵的奢侈品,能明确而灵活的表现阶级等级关系,一度被统治阶层所独享。

统治阶层除了自己使用外,还将鹿胎用于祭祀、封禅、赏赐和作为“乞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礼品。祭祀和封禅都是封建王朝极为重视的大事,所用祭品都有严格的规定,而鹿胎则为必备之物。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诏西川纳绫罗锦、鹿胎、透背,其裹绢并令内藏入账收数,送染院染黄,充封禅之用。”^②又如天禧四年(1202),三司在对减少益、梓两州上供鹿胎数量奏疏的批复中就说到“及国信往来、南郊支用的绫罗锦绮、鹿胎、透背、欹正、生白大小绫花纱绢不得减免,欲且依旧。”^③

赏赐的对象主要是功臣、立有战功的士兵和外蕃。如雍熙四年(986),令节度使给皂地金线盘云凤鹿胎旋襴,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给皂地金线盘花鸳鸯^④。天圣元年(1023),三司盐铁副使俞献可言:“川界每年织造锦绮、鹿胎等,所破物料倍有损费。欲望似此不急之物,除支赐近上武臣及蕃戎并合要缘饰,只令在京量事织造,其余权且停止。”^⑤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天圣年以后,用于赏赐有战功士兵的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等物,多达五十万匹^⑥。鹿胎应是统治阶层的“专属”之物,赏赐给臣下及外藩是想起到笼络和激励之效。

如此珍贵之对象,也被当做“乞和”的礼品。《大金吊伐录》中记载了宋金两国皇帝的书信,其中就提到宋向金三次供鹿胎,共二百五十四匹^⑦。又《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户部言:‘行在左藏东库申:‘本库排办每年金国使人贺正旦及生辰两次到阙,各合用红地细锦一十匹,内翠毛六匹,小盘球锦充;倒仙四匹,以方胜锦充;鹿胎五匹,以杂花锦充。’缘本库并无见在,乞下左藏封桩下库依年例数目预行支拨。”从之。”^⑧实际上,无论是用于祭祀、封禅、赏赐,还是作为“乞和”的礼品,鹿胎的使用权和分配权都在统治阶层手里,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符号之一。

(三) 普通民众的“鹿胎”消费动因

统治阶层虽然严格规定了服饰的等级,试图独享奢侈品的使用权,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奢侈品普及到中产乃至庶民阶层成为必然的趋势。如果拿南、北宋比较,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中记载他于北宋末年在汴梁所见“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但到南宋时朱熹就无奈地感叹道:“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⑨

北宋景祐三年(1036),中书门下言:“臣庶之家,多剝鹿胎以为冠饰,比来寝盛。”^⑩又南宋绍兴二

①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岁时·序拜》,《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8247页。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51之2.3,第5675-5676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闰十二月辛未,第2233页。

④ 《宋史》卷153《舆服五》,第3572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20,第6109页。

⑥ 《宋史》卷179《食货下一》,第4370页。

⑦ 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中华书局,2001年,第151、156、273页。

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51之13,第5681页。

⑨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1《礼八·杂仪》,中华书局,1986年,第2330页。

⑩ 《宋会要辑稿》舆服4之6,第1796页。

十三年(1153),“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①说明从上层的官宦之家到底层的普通民众都热衷于以鹿胎冠为饰。官宦之家自不用说,他们是特权阶级,具有享受奢侈品的经济实力和权力。而庶族之家为什么也对这种奢侈品趋之若鹜呢?原因可归结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条件主要有二:第一,宋代的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经济繁荣,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地主阶层,他们有经济实力消费奢侈品。第二,宋代时,水陆交通运输条件极大改善,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城乡市场的活跃为奢侈品的贩运和流通提供了条件。

主观方面是普通民众想借助奢侈品提高身份地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仑认为新的中产阶级是把时尚当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来使用,他们通过惹人注目的消费、浪费和闲暇来表示他们的富有。时尚是用来表征阶级差异的一种形式,精英阶级总是力图用一种明显的标志如服饰或生活方式等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想借用这些标志来提高自己的地位^②。鹿胎长期被统治阶层所使用和独享,已经成为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布裘藜杖鹿胎冠,散率身如不在官。昼枕静欹地远梦,秋窗闲坐有微寒。”^③描写了一位官员罢官或致仕后的心境,其中的“布裘”、“藜杖”、“鹿胎冠”都是稀罕之物,可以说这些物品是官宦阶层的一种自我标识。“暗香消歇粉妆残,点点虚庭碧藓间。却怪贫家新富贵,地茵纯用鹿胎斑。”^④说明贫困之家富贵后,也要用与鹿胎形似的梅花装饰庭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鹿胎冠的实际效用并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方面,而是想通过使用“精英阶层”的物品来提高、展示或炫耀自己的等级、地位或品味。

(四)文人士子阶层的“鹿胎”消费动因

鹿胎冠,一般认为是一种女冠^⑤。但实际上宋代的男性也有戴鹿胎冠的风尚,而这其中又有一批特殊的群体,即文人士子阶层。《锦绣万花谷》有苏东坡诗云:“头戴鹿胎,皮身披鹤氅衣,月寒丹井立,霜白醺坛归。”^⑥他们消费鹿胎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子中爱梅的风气。

“梅兰竹菊”号称花中四君子,其中以梅为首,古时士人爱梅的风气一直存在,不仅因为它是一种美丽的花卉意象,更在于它自强不息、不作媚世的象征意象。宋代时,对于梅的研究和颂扬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杨万里《洮湖和梅诗序》云:“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躋藉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梅于其间首出桃李兰蕙而居客之右,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此时者也。”^⑦范成大更是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梅谱》,记录了十二个梅花品种及梅花培育方法^⑧。文学作品也不断涌现,《全宋词》中题为梅词者达880余首^⑨,《全宋诗》中咏梅的诗句更是多不胜数。

簪花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独特,全民化的文化活动^⑩。而梅花又是文人士子最钟情的花卉之一。有诗为证:“独坐无聊感岁华,骚人忽寄一枝花。虽无素手簪罗髻,已觉春生野老家。”“带月簪梅花,独起舞残雪。”“起舞簪花老尚狂,梅花应记旧高阳。”^⑪但是梅花季节性明显,只有在冬春时节才有,且保

① 《宋史》卷65《五行三》,第1429页。

② 摘自杨向荣:《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③ 李昉《退官》,《氏族大全》卷13《凤阁鳌宫》,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6册,第182页。

④ 杨公远《残梅》,曹廷栋辑:《宋百家诗存》卷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28页。

⑤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⑥ 佚名:《锦绣万花谷·前集》卷3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4-415页。

⑦ 杨万里:《诚斋集》卷80,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88册,第35页。

⑧ 陈平平:《范成大与梅花》,《中国园林》1999年第4期。

⑨ 葛金平:《中国古典诗歌梅文化意象与高趣》,《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

⑩ 谭艳玲:《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⑪ 吴芾《和李民载梅花二首》,徐鹿卿《月夜赴郡会归辗转不成寐触事感怀》,陈纪《和赵华颠梅花》,《全宋诗》,第21990、36943-36944、44652页。

鲜性差,不能长期佩戴。在这种情况下,鹿胎冠就成了文人士子“附庸风雅”最好的代替品。鹿胎皮“皮毛鲜泽,文彩可爱”,纹路上有白色的斑点,与梅花形似。《洛阳牡丹记》即形容“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①

萧立之《残梅》云:“玉龙战退鹿胎干,好在晴沙野水看。”^②“鹿胎干”指凋谢的梅花,以“鹿胎”来指代梅花,一语道出两者的关系。李觏《送黄承伯》云:“君来别我向番阳,时节初春晓尚霜。茶褐园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③方岳《早春山中》云:“竹边门自不须关,留与山云共往还。芳草初齐梅点点,绿丝茸地鹿胎斑。”^④都说明当时文人有以鹿胎喻梅花的习惯。

从苏东坡《西江·梅》、《赠岭上梅》等众多咏梅的诗句来看,他也是一个爱梅雅士^⑤,前引《锦绣万花谷》曾有苏东坡“头戴鹿胎,皮身披鹤氅衣”之句,可见爱梅与戴鹿胎冠好尚相关。他的雅行,对世人颇有影响,如鹿泉居士王觉民即好种梅,尝和东坡《忆梅韵》记其事:“鹿泉居士身若槁,不惯看花梦颠倒。桐庐有客燕新昏,妄托娇痴重伊恼。冻云垂地雪欲落,断雁叫群天尚早。一枝何处寄春来,便觉寒窗自华好。琼瑶万里眼界净,咫尺前村莫轻扫。留将青女伴孤芳,长向茅斋照衰老。先生才思老不进,寤寐池塘见春草。对花酌酒祝东君,烦把穷通问苍昊。”^⑥

主人公因为爱梅,也喜着鹿胎冠出游,有《赋春雪词追和东坡韵》词为证:“阳气初升土脉苏,东郊人散欲回车。一时春雪十年无,鱼枕蕉深浮酒蚁。鹿胎冠小粲歌珠,题诗不觉烛燃须。”^⑦

南宋时,宋理宗召见罗必元曰:“见卿梅花诗,足知卿志。”^⑧以梅明志,乃是古代士人标榜气节的方式,鹿胎冠因形似梅花的缘故亦成为他们所追逐的对象。

三、从“鹿胎”消费看宋人的环保意识

孟子讲“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中国儒释道思想中也不乏禁止捕杀动物的禁令^⑨,说明古人存在对自然生物资源原始和朦胧的保护观念。宋朝亦是如此,《六书故》就载:“麋,莫兮切,鹿胎也。凡孕兽曰麋,鸟曰卵,《周官》禁麋、卵者。”^⑩但是这种环保意识当真如今天学者们所宣扬的那样先进吗?恐怕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在论述宋人环保意识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古代环保意识多是统治阶层,而非宋朝广大民众的意识。因为我们通过解读相关文献来探知时人的环保意识,而这些文献的纂述者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属于广义上的统治阶层。当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虽不能代表所有的社会阶层,但作为社会中知识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他们对环境的态度决定着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高度。他们确实有很多反对残忍杀生的言论,但从鹿胎的使用情况看,他们是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与普通民众追求奢侈消费的目的相比,他们爱梅

①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79册,第2页。

② 厉鹗辑:《宋诗纪事》卷6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73页。

③ 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37,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页。

④ 方岳:《秋崖集》卷2,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95册,第50页。

⑤ 据今人统计,苏东坡一生咏梅诗有四十二首之多(见葛金平:《中国古典诗歌梅文化意象与高趣》,《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

⑥ 王觉民:《鹿泉居士王觉民颇有杜子美不彻之恼和东坡忆梅韵箴其膏肓》,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20165-20166页。

⑦ 王道之:《相山集》卷16,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436页。

⑧ 《宋史》卷415《罗必元传》,第12460页。

⑨ 夏炎:《中古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古代环境保护问题再认识》,《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⑩ 戴侗撰,党怀兴、刘斌点校:《六书故》卷18《动物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398页。

的动因也显得有些特殊。较之其它野生动物,获取鹿胎需“一物而伤二命”,更加违背儒家思想的宗旨,但为了宣扬“气节”,还是乐于使用。显然,他们的环保言论与实际的消费活动并不统一,有“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士大夫阶层在阐述环保思想时以“天人合一”的宇宙哲学观和“中庸”的处世道德观为基础^①,与其说主旨和目的是环境保护,不如说是一种哲学、道德、宗教伦理方面的思考和期望。

普通民众是社会中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阶层,更难说已经形成了系统和自觉的环保意识。对他们来说,捕杀野生动物更多的是考虑效用性,并不会考虑是否会导致动物灭绝之类的环保问题。鹿胎象征着一特定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民众通过拥有它们,就拥有了炫耀的资本,在精神层面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仅鹿胎,对其它野生动物的捕杀也完全不考虑杀生的残忍。如当时社会上曾经流行一种被称为“龟筒”的器材,乃是从大龟上活剥下来的背甲。夏竦就上奏到:“江西、闽越之民,多采山泽大龟,倒植坎中,生戕去肉取其甲,谓之龟筒。痛楚之声,所不忍闻,得直至微,而残物尤甚,请严禁止。”^②再如狨座,是一种用狨毛皮缝制的座褥。江少虞谓:“狨类鼠而大,尾长而金色,生川峡深山中,人以药矢射杀之,取其尾,为卧褥鞍被坐毯之用。”^③叶梦得亦谓:“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狨座);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④类似的对鳄鱼、大象、犀牛、老虎、鸟类捕杀的记载也很多,可见这些用野生动物制成的奢侈品已经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开来。他们偶尔的一些环保行为或是因害怕遭受“天谴”,或是出于怜悯和生存的需要,而非明确和自觉的环保意识的体现。

环保意识之强弱还具体体现于环保法令及其实施情况^⑤,故有必要对今人颇多赞许的环保法令和实际效果进行论述。宋代的环保法令散见于《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等书,其中以《宋大诏令集》最为集中,诏令就有十条之多,时间从建隆二年(961)到天禧三年(1019)。其实后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禁令^⑥,如《宋朝事实》载:

上(宋仁宗)尝谓近臣曰:“……比闻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乃有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者,以致诸处采捕,杀害生牲,宜严行禁绝。”乃下诏曰:“……宜令刑部遍牒施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如有违犯,许人陈告,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赏钱二十贯。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赏钱五十贯。以犯人家财充。”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⑦

与前代相比,这些禁令数量众多,且被重复颁布,可以推知当时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是多么普遍而严重^⑧。类似的情况还出现于森林等植物资源,当时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森林保护法令,但树木还是被大量砍伐^⑨。那么这些禁令是否就说明宋人已经有了明确的环保意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学者就通

① 张全明:《简论宋代儒士的环境意识及其启示》,《文史博览》2006年第8期;《论宋代道学家的环境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论宋代士大夫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启示》,《历史文献研究》2013年。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正月甲子,第2406页。

③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1《风俗杂志·麝裂脐狨牦牛断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13-814页。

④ 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第124页。

⑤ 厚宇德、王盼:《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及其在〈宋大诏令集〉里的新寓意》,《宋史研究论丛》,2012年。

⑥ 程民生:《宋代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1984年第3期。

⑦ 李攸:《宋朝事实》卷3,中华书局,1957年,第34-35页。

⑧ 魏华仙:《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⑨ 谢志诚:《宋代的造林毁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第2集,三联书店,1981年;熊燕军:《试论北宋林木破坏的历史转折》,《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马泓波:《宋代植树护林的法律规定及其社会作用》,《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李巍涛、李晓峪:《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法制研究》,《武陵学刊》2013年第4期;等等。

过分析《宋大诏令集》中的禁令,认为其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动物,而是统治者为了树立自己仁爱、恭俭的形象,灵活地宣扬帝系正统、维护君主决策乃至强调君权神授,并最终在“德泽禽兽”的表象下因事制宜地加强皇权^①。这些禁令本质上都是出于现实的实用主义之考虑,并非环保意识的体现。

姑且不论颁布禁令的初衷是什么,其实施效果又如何呢?从前文所述市场交易量看,捕杀胎鹿的情况并未终止。到了南宋,又再度成为人们追逐时髦的对象。政府不得不再次重申禁采鹿胎的规定,绍兴六年、八年、二十三年、二十九等年间,高宗屡次颁布“禁采鹿胎”、“不得戴鹿胎冠子”的诏令^②。就统治者来说,他们既是倡议者,也是破坏者。《宋史·食货志》载:

布帛。……则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天圣中,诏减两蜀岁输锦绮、鹿胎、透背、欵正之半,罢作绫花纱。明道中,又减两蜀岁输锦绮、绫罗、透背、花纱三之二,命改织绡、绢以助军。景祐初,遂诏罢输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闾巷皆禁用。其后岁辄增益、梓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复减半。既而又减梓路岁输绢三之一,红锦、鹿胎半之。^③

可见,对于上供鹿胎的事情,统治者的态度暧昧不定,上供数时少时多,但始终都未完全罢供。甚至可以说统治者对鹿胎有依赖性,天禧元年(1017)三月三司请令益州罢供鹿胎、透背,改以衣帛上供军衣。但皇帝却说:“此色皆内藏所实,每郊礼,以充赏给,罢之非便。”令三司与内藏同议以闻。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上京发出诏令,规定“除锦三十五段全减不织外,余绫罗、鹿胎、透背、欵正、生白大小绫、花纱绢等,欲且依旧。所贵支用不至误阙。”^④而对于士兵违反禁令捕杀野生动物的处罚也并未落到实处。太平兴国五年(980)冬,太宗在近郊检阅军队,有士兵违背禁止盗猎的法令,按律当死。但太宗则曰:“我若杀之,后世必谓我重兽而轻人。”释其罪^⑤。可见,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可以随时变更禁令。反映在法令条文上,即出现了与“严禁”对立的“弛禁”规定,《宋会要辑稿》载: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诏曰:“……宜令诸处市买场及织造院,除供军绫、罗、绡、布、绡、绢、绵外,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欵正、龟壳等匹段,不得更买及织造。”民间有织卖者,勿禁。^⑥

说明当时民间织卖的鹿胎并不在禁令范围之内。而从前文所述累次上供的情况看,所谓的“官织悉罢”、“不得更买及织造”等禁令也都只停留在书面形式上。到了南宋,“弛禁”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宰执奏禁涂金、铺翠、鹿胎等首饰。上曰:‘宫中禁之甚急,民俗久当自化,不必过为刑禁也。’”^⑦而朝臣对于禁止采捕鹿胎也多持不以为然的態度,《宋史·秦桧传》记载了这样一则材料,“桧擅政以来,屏蔽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诋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⑧可见当时的大臣把“销金铺翠”、“禁鹿胎冠子”都看做小事,并且讥笑“秦桧党人”以这些事上奏“以充国事”。

① 孙方圆:《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以〈宋大诏令集〉为考察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② 《宋史》卷28《高宗纪五》、卷31《高宗纪八》,第525、578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秋七月辛巳”、卷165“绍兴二十三九月庚子”、卷181“绍兴二十九年春正月戊戌”,第1963、2698、3003页。

③ 《宋史》卷175《食货上三》,第4231-4232页。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9、20,第6109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甲戌,第482页。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7,第6108页。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辛巳,第1963页。

⑧ 《宋史》卷473《秦桧传》,第13763页。

关于禁令失效的原因,除了过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外,还与当时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有关。消费和需求本身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体,当社会需求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时,消费观念亦会相对合理,这时的禁令也往往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而一旦社会需求不合理的过度膨胀,消费观念也会随之畸形发展,禁令往往会形同虚设。宋代的奢侈消费与前代相比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①。所谓的大众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消费主体范围由社会上层向中下层扩展的事实;二是指消费人数的增加。鹿胎虽然名贵,但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追逐的对象,这恰是奢侈消费大众化的表现。所谓的禁令只是制度条文方面的规定,而与实际的落实、执行往往有很大的出入。

总之,笔者认为无论是从颁布禁令的初衷还是从实际效果看,宋代禁止杀生的禁令并未落到实处,我们今天也大可不必对这些禁令评价过高。在丰厚利益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影响下,官府的禁令只能是无足轻重的纸上文字,儒家反对杀生的环保言论也只能为文人士子“宣扬气节”的风尚让路。宋人或许有原始和朦胧的环保观念,但并不明确和系统,也不是自觉意识的体现,更不可与今天的环保思想进行类比。

四、余 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的开发、人口的增长,人与动物的平衡被打破,人类对野生动物捕杀也从维持生存的需要转变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鹿胎被当时各个阶层的人所追逐,这恰恰展现了经济文化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矛盾。在当代的社会中也存在这种矛盾,从宋朝的经验看,要真正做到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管理者要做到身体力行,同时要从文化层面扼杀不良的奢侈之风,务求使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消费风尚。

针对现今学界对古人的环保措施、法令、观念的研究情况,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误区。首先,从研究结论来看,大多数人认为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环境保护体系和思想,有较健全的环保法制、法规,这一光荣传统一直被后世沿用,对古人环保方面的贡献也颇多赞赏和溢美之词。但是,从历史事实看,宋代是我国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恶化的阶段之一^①。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切不可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用今人的理念去揣度古人。今天我们如此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尚不能杜绝偷猎盗猎行为,古人何以能建立起系统的环保观念。其次,古人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探讨古人杀生行为时切不可一刀切,以“好”或者“坏”的标准来评价。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扩大,人们与野生动物争夺生存空间,并战胜它们,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能苛求古人去“保护环境”,也不能责备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自然环境。最后,我们今天在探讨人地生关系时,不仅要人放在大的生态环境背景下去探索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应该关注人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因去影响于环境,这种动因因空间、时间、部门和主体的差异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只有考虑这些,我们才能总结历史教训,建设生态文明。

(下转第 112 页)

① [日]斯波义信著,庄景辉译:《宋代商业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7,第473-479页。刘旭东:《略论两宋时期自然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姜正杰、吴寒雨、齐金杰:《自然环境的变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科协论坛》2007年第2期;邹彦群:《宋代环保思想刍议》,《自然辩证法刍议》2010年第6期。